

阶层流动的“双刃剑”效应及其心理机制

张跃 郭永玉** 丁毅 李凯

(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南京, 210097)

摘要 阶层流动是指人们在社会分层体系中相对位置的变化。人们普遍预期, 向上流动促进个体发展和社会进步。然而近期研究也表明, 向上流动还可能损害个体健康和主观幸福感, 使人们低估和容忍社会不平等, 并反对再分配。文化适应论、分离论、地位认同、贫富归因倾向以及系统公正信念能够解释阶层流动的“双刃剑”效应。未来研究需要进一步澄清阶层流动感知的具体表现, 深入考察阶层流动影响的心理机制, 探索促进阶层流动积极效应发挥的干预方法。

关键词 阶层流动 健康 主观幸福感 社会公平 “双刃剑”效应

1 引言

请想象一下, 如果你生活的周围刚出生了一名婴儿, 在他(她)成年后, 有多大可能会成为比其父母更富有或更贫穷的人? 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即体现了人们对阶层流动的判断。阶层流动(class mobility)是指人们在社会分层体系中相对位置的变化, 可分为向上流动与向下流动(Hout, 2015)。客观的阶层流动会反映在主观层面上(郭永玉, 杨沈龙, 李静, 胡小勇, 2015), 因此研究者也关注阶层流动感知(perception of class mobility), 即个体对社会整体或个体自身阶层流动的主观判断与预期(Kraus & Tan, 2015)。

阶层流动及其感知对个体与社会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一方面, 阶层流动是个体利益获得的重要途径。向上或向下流动不仅反映了个体在社会阶层上(即经济收入、受教育水平以及职业等方面)的改变, 更涉及与之相关的利益、资源和声望的获得或损失。因此, 人们普遍预期向上流动会使个体受益(Chan, 2018)。另一方面, 阶层流动是社会公平的重要体现。阶层流动反映了社会成员实现成功的机会平等和程序公正, 高水平的阶层流动及其感知使人们相信社会阶层之间的开放性与可渗透性, 从而提升社会公平感, 促进社会稳定(Day & Fiske,

2017)。不过, 近期的研究表明, 阶层流动对个体与社会的影响并非完全积极。向上流动也可能损害个体健康(Simandan, 2018)、降低主观幸福感(Hadjar & Samuel, 2015); 同时, 阶层流动感知也会成为再分配等社会改革措施的阻碍因素, 不利于减少社会不平等(Manstead, 2018)。

可见, 阶层流动可能具有积极影响与消极影响并存的“双刃剑”效应。尤其值得提出的是, 阶层流动通常被认为是社会公平与和谐的重要保障, 而阶层流动的消极影响可能不利于社会公平的实现。近几年社会中广泛争议的“农村大学生”、“凤凰男”等现象即是对这一社会问题的现实注脚。如何理解阶层流动复杂深刻的心理效应? 如何尽最大可能发挥阶层流动的积极效应? 基于心理学的视角, 本文分别从个体(健康与主观幸福感)和社会(社会公平)两个层面梳理和总结阶层流动的影响及其心理机制, 以期更加深入地理解阶层流动的“双刃剑”效应及其解释, 为相关社会治理工作提供心理学思路。

2 阶层流动的影响: 健康与主观幸福感

阶层流动涉及个体阶层位置的改变, 且这种改变不仅伴随着个体收入、机会和社会声望等经济和社会资源的获得与损失, 还通常会渗透在个体的“身体”里, 对个体的健康和主观幸福感有着广

* 通讯作者: 郭永玉。E-mail: yyguo@njnu.edu.cn

DOI:10.16719/j.cnki.1671-6981.20190530

泛的影响（尤瑾，安蕾，沈海坤，朱颖，李彩娜，2018）。因此，阶层流动对个体健康和主观幸福感的影响首先得到心理学、社会学等诸多学科的关注。

2.1 健康

阶层流动是影响个体身体与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Simandan, 2018）。与高阶层者相比，低阶层者往往面临更高的健康风险，患某些生理疾病的几率更高，死亡率也更高（尤瑾等，2018）。因此，向上流动被认为可以显著提高个体的身心健康水平。的确，有研究发现阶层流动是降低健康不平等的重要途径（王甫勤，2011）。不过，也有研究发现，向上流动会使人们付出健康代价（Simandan, 2018）。尤其对于低阶层者而言，向上流动更可能会增加他们的健康风险。比如，与来自高阶层的大学生相比，出身于低阶层或工人阶层的大学生在通过教育实现向上流动的同时，更可能出现适应问题，体验到更多的负面情绪（Chen, Miller, Brody, & Lei, 2015; Stephens, Townsend, & Dittmann, 2019）。此外，短距离的代内向上流动会损害健康。比如，池上新（2016）通过对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2008）分析发现，短距离的代内向上流动有损于居民健康，即向上流动是一代人牺牲自身的健康来保障下一代人较高的健康水平。

2.2 主观幸福感

以往横断研究表明，高阶层者普遍比低阶层者更幸福（Stevenson & Wolfers, 2008）。因此，在阶层流动过程中，伴随社会阶层的提升，人们也会表现出更高的主观幸福感（Schuck & Steiber, 2018）。比如，Chan（2018）通过对英国家庭小组调查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同样是出身于工人阶层，与没有流动的个体相比，实现了向上流动的个体在社会支持、主观幸福感等指标上的得分更高。然而，也有研究发现了不一致的结论。向上流动对主观幸福感的积极效应可能受到社会阶层、社会不平等的影响。首先，与高阶层者相比，向上流动并未提升低阶层者的主观幸福感。比如，尽管很多低收入者通过教育实现了向上流动，但却更普遍地遭遇社会孤立与歧视经历，体验到更低的主观幸福感（Rheinschmidt & Mendoza-Denton, 2014）。其次，社会不平等程度较高时，向上流动可能降低主观幸福感。比如，相比不平等程度较小的瑞士，在不平等程度较大的英国，向上流动会负向预测主观幸福感（Hadjar & Samuel, 2015）。

2.3 阶层流动对健康与主观幸福感影响的机制

总体来看，向上流动对健康与主观幸福感的积极影响是有限的，在社会阶层、流动距离、社会不平等因素的作用下，个体在经历向上流动的同时，也可能付出健康代价、降低主观幸福感，并且，低阶层者在向上流动中面临的风险更高。对此，研究者通过文化适应论、分离论与地位认同分别提出了不同的解释。

2.3.1 文化适应论

文化适应论（acculturation thesis）主要关注向上流动对个体的积极影响（Blau, 1956）。该理论认为，阶层流动包含一种再社会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个体会逐渐摒弃在原生阶层中习得的价值观、规范与习俗，努力适应新的阶层环境。不过，不同流动经历对个体的影响是不同的，向上流动更可能给个体带来积极的影响（Daenekindt, 2017）。具体来说，向下流动会使个体产生挫败感，在适应过程中也面临更多的压力与困难；而向上流动则会使人们更积极地适应阶层位置的变化，表现出努力、坚毅、负责等积极特征（Sieben, 2017）。人们在向上流动中获得更高的阶层与地位，因此更可能在健康、幸福感等方面获益。很多研究证实了文化适应论的观点（Chan, 2018）。不过，该理论主要关注了向上流动对健康与主观幸福感的积极影响，但却忽视了它可能对个体产生的消极影响。

2.3.2 分离论

基于阶层流动可能对个体产生的消极影响，Sorokin（1959）提出了分离论（dissociative thesis）加以解释。该理论认为，阶层流动使个体脱离了原生阶层，然而，在原生阶层中形成的特定习惯、自我概念与行为方式使个体很难完全适应新的阶层环境（Manstead, 2018），因此这种矛盾体验会降低个体的归属感，并使他们产生焦虑、紧张等分离体验，从而增加健康风险（Houle, 2011）。比如，向上与向下流动可能会使个体表现出更高的社会孤立感（即无法建立亲密关系、缺失社会接纳）、功利个人主义（即更关注个人利益，而忽视他人或集体利益）与社会迷失感（即迷失了指导生命意义的价值）（Daenekindt, 2017），进而对健康（Simandan, 2018）与主观幸福感（Hadjar & Samuel, 2015）产生消极影响。分离论为理解阶层流动对个体的消极效应提供了一种视角。然而，这种片面的解释仍然无助于我们全面地理解阶层流动的“双刃剑”效应。

2.3.3 地位认同

不同于传统文化适应论与分离论的片面观点,地位认同为解释阶层流动的积极与消极影响提供了一种整合框架(Destin & Debrosse, 2017)。具体来说,地位认同(status-based identity)是指人们关于自己社会经济地位的主观价值与理解(Destin, Rheinschmidt-Same, & Richeson, 2017)。保持积极、确定的地位认同是个体的一种基本需要,当这种需要得到满足时,向上流动会提升健康与主观幸福感。然而,个体在经历向上流动的同时也可能出现适应困难(Stephens et al., 2019),导致地位认同的不确定性,即降低自我一致性、社会归属感以及对未来自我的确定预期,从而对健康与主观幸福感带来威胁(Simandan, 2018)。尤其对于低阶层者而言,保持地位认同的确定性更加困难,他们在实现向上流动的同时也更可能罹患糖尿病、心脏病和癌症等慢性疾病(Destin, 2019)。为了验证地位认同的作用,Destin等(2017)开发了地位认同不确定性量表,并通过调查法研究发现,那些通过教育实现向上流动的低阶层大学生表现出更高水平的地位认同的不确定性,更为重要的是,地位认同的不确定性可以显著预测他们较低的自尊与生活满意度。

3 阶层流动的影响:社会公平

阶层流动是社会公平的重要体现。总体来看,阶层流动及其感知将会影响人们对社会系统与社会改革的态度,成为社会公平的重要影响因素。在当前研究中,这种社会影响主要体现在不平等态度与再分配偏向这两个方面。

3.1 不平等态度

社会分层与不平等是社会生活的一个基本现实(郭永玉等, 2015)。然而,尽管社会不平等普遍存在,人们却倾向于低估社会不平等的程度(Kraus & Tan, 2015)。近期的研究表明,阶层流动是影响不平等态度的重要因素。例如,Shariff, Wiwad 和 Akinin (2016)研究发现,阶层流动水平越高,人们越倾向于低估、甚至容忍社会不平等。不平等态度还体现在系统维护意愿、群际认知以及政治信任等方面。例如,在系统维护方面,Day 和 Fiske (2017)研究发现,个体感知到阶层流动水平更高时,他们的系统维护意愿(如对政府政策的支持)也更强;在群际认知方面,研究表明向上流动预期将会降低(提升)人们对优势群体的消极(积极)内隐态度(Liu,

Zhang, & Hao, 2017);此外,在政治信任方面,盛智明(2013)的研究发现,向上流动及其主观感知显著增强了人们的政治信任,有助于促进社会稳定。

3.2 再分配偏向

再分配偏向(redistributive preferences)是指人们对再分配政策的态度与支持程度(Bullock, 2017)。研究发现,经济不平等程度越高的国家,人们反而越少支持再分配(Sánchez & Goda, 2018);尤其是与工薪阶层相比,经理、私营企业主等高阶层者往往表现出更低的再分配偏向(Bullock, 2017)。阶层流动被认为是导致这一困境的重要影响因素(Manstead, 2018)。当社会整体的阶层流动水平或自我向上流动机会较高时,人们更倾向于不支持再分配政策;反之,人们则会表现出更高的再分配偏向(Shariff et al., 2016)。研究者通过实验操纵来考察阶层流动对再分配偏向的影响,也发现了一致的结论。比如,Wakslak, Jost, Tyler 和 Chen (2007)引导被试阅读阶层流动相关的信息操纵阶层流动感知,当人们感知到较高的阶层流动时,道德愤怒与消极情感显著降低,并且更不愿意帮助弱势群体。

3.3 阶层流动对社会公平影响的机制

总结当前研究发现,阶层流动及其主观感知在提升人们对不平等的容忍、促进社会稳定的同时,也会降低高阶层者的再分配偏向。由于人们往往高估社会阶层流动水平(Kraus & Tan, 2015),这种知觉偏差可能会成为阻碍社会变革、扩大社会不平等的潜在影响因素。贫富归因倾向与系统公正信念为阶层流动社会影响的作用机制提供了解释。

3.3.1 贫富归因倾向

阶层流动通过贫富归因倾向影响人们的不平等态度和再分配偏向。阶层流动水平较低时,人们更可能将自我现状和社会贫富差距归因于社会限制或运气等外部因素(而非能力、努力等内部因素)(Kraus & Park, 2017)。这种归因倾向进一步影响人们对社会公平的感知与判断(Davidai, 2018)。比如,Shariff等(2016)通过设置两种虚假的“官方”资料,启动被试的阶层流动感知,随后测量他们对自我经济现状的归因倾向以及对社会不平等的态度。结果发现,与“低流动率”启动组相比,“高流动率”启动组的被试更倾向于将自我经济现状归因于自我努力(而非社会环境),也更倾向于低估、甚至容忍社会不平等;进一步分析发现,内归因倾向在阶

层流动与不平等容忍之间起到中介作用。Alesina, Stantcheva 和 Teso (2018) 通过调查和实验研究发现, 美国社会对代际流动更加乐观, 相信自己通过努力和能力致富, 因此不支持再分配政策; 与之不同, 欧洲社会对代际流动更加悲观, 倾向于认为财富获得与个体的家族史、社会阶层密不可分, 因此更加支持再分配。

3.3.2 系统公正信念

系统公正信念也为阶层流动的社会影响提供了另一种解释。人们倾向于将自己所在的系统感知为合理的、公正的, 这种系统公正信念是人的一种基本动机 (Jost, 2019)。当个体相信社会成员的相对阶层位置可流动时, 他们会更加支持即使并不平等的社会系统 (Day & Fiske, 2017)。因此, 阶层流动信念也被定义为一种系统公正信念 (Sagioglou, Forstmann, & Greitemeyer, 2019)。阶层流动信念有助于提升人们对未来自我阶层流动的积极预期 (Shariff et al., 2016), 从而使人们合理化不平等现状, 反对再分配等社会变革举措。比如, Jaime-Castillo 和 Marqués-Perales (2014) 通过调查研究发现, 当阶层流动信念比较高时, 人们会反对再分配等社会福利政策; 而当人们感知向上流动的机会不公平时, 则更倾向于支持更大的政府责任, 并反对精英主义与自由竞争。此外, García-Sánchez, Osborne, Willis 和 Rodríguez-Bailón (2019) 的跨文化调查研究也表明, 当个体阶层流动信念较高时, 即使社会不平等感知较高, 也表现出较低的再分配偏向, 即更不看重政府在降低不平等中的责任, 反对加大征税力度。

4 总结与展望

基于个体和社会的视角, 本文介绍了阶层流动对健康、主观幸福感和不平等态度、再分配偏向的影响及其机制。阶层流动是个体利益获得的重要途径, 是社会公平的重要体现。然而, 不容忽视的是, 向上流动也可能使个体 (尤其是低阶层者) 产生分离体验, 增加地位认同的不确定性, 进而损害其健康与主观幸福感; 此外, 高估阶层流动的知觉偏差使人们偏好对社会不平等进行内归因, 在系统公正信念的作用下, 使人们低估、甚至容忍社会不平等, 并反对再分配政策等社会变革举措。总体来看, 阶层流动及其主观感知也会带来消极影响。心理学领域对阶层流动及其影响的研究方兴未艾, 未来研究有诸多可探讨之处。

第一, 进一步明确我国社会阶层流动的现状和具体表现。伴随经济社会的发展, 我国社会阶层流动率显著提升, 但也面临阶层固化的风险 (李路路, 朱斌, 2015)。在此背景下, 我国居民存在更多“低位认同”的阶层认同偏差 (陈云松, 范晓光, 2016), 这可能成为影响阶层流动感知的潜在因素 (Davidai, 2018)。此外, 阶层流动的测量方法也存在很多不足。在客观阶层流动方面, 收入、教育、职业等不同客观指标的内在不一致性仍然普遍存在, 这就要求采用多元的客观测量 (范晓光, 陈云松, 2015); 在阶层流动感知方面, 测量方法的不同导致研究结论的不一致, 问题设置、社会阶层等级的划分等都会影响人们判断的结果 (Davidai & Gilovich, 2018)。因此, 未来研究在完善测量方法的同时, 需要进一步考察此类测量方法在国内的适用性。

第二, 深入考察阶层流动“双刃剑”效应的作用机制。首先, 向上流动的影响是积极还是消极仍然没有定论。比如, 在个体层面, 有研究发现向上流动并不能直接预测主观幸福感 (Iveson & Deary, 2017)。但是, 由于向上流动涉及阶层位置的上升, 而社会阶层对健康与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预测作用, 因此,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推测, 向上流动通过使个体获得更高的社会阶层, 从而对健康与主观幸福感产生间接的积极影响。其次, 竞争取向、价值观等其他心理和情境因素也可能是阶层流动对个体与社会影响的中间机制。当阶层流动水平较高时, 会使人们感知到更大的竞争 (Sommet, Elliot, Jamieso, & Butera, 2018), 增强个体的竞争取向, 进而加剧社会孤立等消极体验, 并使高阶层者反对再分配政策。此外, 基于现有的研究而言, 研究者通常采用不同心理机制分别解释阶层流动对个体与社会的影响, 尚缺少一个较为合理的整合性解释框架。

第三, 探索有效的干预方法, 促进向上流动积极作用的发挥。如何降低向上流动所带来的健康代价与幸福感损失? 向上流动及其主观感知是否必然会阻碍再分配等社会变革举措? 近期的研究发现, 通过采用心理干预方法, 能够降低阶层流动对个体与社会的消极作用。比如, 在个体层面, 通过引导阶层流动者建立积极的地位认同, 将会提升他们的健康与主观幸福感 (Destin, 2019)。在促进社会公平的改革举措方面, 通过设置不公平框架, 引导高阶层者客观认识社会不平等程度, 将会改善他们对

再分配的态度 (Rosette & Koval, 2018)。可见, 未来研究需要深入挖掘有效的干预方法, 促进向上流动积极作用的发挥。

参考文献

- 陈云松, 范晓光. (2016). 阶层自我定位、收入不平等和主观流动感知 (2003–2013). *中国社会科学*, 12, 109–126.
- 池上新. (2016). 阶层流动与中国居民的健康及其不平等. *贵州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5, 50–59.
- 范晓光, 陈云松. (2015). 中国城乡居民的阶层地位认同偏差. *社会学研究*, 4, 143–168.
- 郭永玉, 杨沈龙, 李静, 胡小勇. (2015). 社会阶层心理学视角下的公平研究. *心理科学进展*, 23(8), 1299–1311.
- 李路路, 朱斌. (2015). 当代中国的代际流动模式及其变迁. *中国社会科学*, 5, 40–58.
- 盛智明. (2013). 社会流动与政治信任: 基于 CGSS2006 数据的实证研究. *社会*, 33(4), 35–59.
- 王甫勤. (2011). 社会流动有助于降低健康不平等吗? *社会学研究*, 2, 78–101.
- 尤瑾, 安蕾, 沈海坤, 朱颖, 李彩娜. (2018). 从毕生发展的视角看健康的贫富差距. *心理科学进展*, 26(9), 1700–1710.
- Alesina, A., Stantcheva, S., & Teso, E. (2018).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and preferences for redistribu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8(2), 521–554.
- Blau, P. M. (1956). Social mobility and interpersonal relation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1(3), 290–295.
- Bullock, H. E. (2017). Social class and policy preferences: Implications for economic inequality and interclass relations. *Current Opinion in Psychology*, 18, 141–146.
- Chan, T. W. (2018). Social mobility and the well-being of individuals.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69(1), 183–206.
- Chen, E., Miller, G. E., Brody, G. H., & Lei, M. (2015). Neighborhood poverty, college attendance, and diverging profiles of substance use and allostatic load in rural African American youth. *Clinical Psychological Science*, 3(5), 675–685.
- Daenekindt, S. (2017). The experience of social mobility: Social isolation, utilitarian individualism, and social disorientation.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133(1), 15–30.
- Davidai, S. (2018). Why do Americans believe in economic mobility? Economic inequality, external attributions of wealth and poverty, and the belief in economic mobility.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79, 138–148.
- Davidai, S., & Gilovich, T. (2018). How should we think about Americans' beliefs about economic mobility? *Judgment and Decision Making*, 13(3), 297–304.
- Day, M. V., & Fiske, S. T. (2017). Movin' on up? How perceptions of social mobility affect our willingness to defend the system. *Social Psychological and Personality Science*, 8(3), 267–274.
- Destin, M. (2019). Socioeconomic mobility, identity, and health: Experiences that influence immunology and implications for intervention. *American Psychologist*, 74(2), 207–217.
- Destin, M., & Debrosse, R. (2017). Upward social mobility and identity. *Current Opinion in Psychology*, 18, 99–104.
- Destin, M., Rheinschmidt-Same, M., & Richeson, J. A. (2017). Status-based identity: A conceptual approach integrating the social psychological study of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identity. *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12(2), 270–289.
- García-Sánchez, E., Osborne, D., Willis, G. B., & Rodríguez-Bailón, R. (in press). Attitudes towards redistribution and the interplay between perceptions and beliefs about inequality.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 Hadjar, A., & Samuel, R. (2015). Does upward social mobility increase life satisfaction? A longitudinal analysis using British and Swiss panel data. *Research in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Mobility*, 39, 48–58.
- Houle, J. N. (2011). The psychological impact of intragenerational social class mobility.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40(3), 757–772.
- Hout, M. (2015). A summary of what we know about social mobility.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657(1), 27–36.
- Iveson, M. H., & Deary, I. J. (2017). Intergenerational social mobility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in later life. *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 188, 11–20.
- Jaime-Castillo, A. M., & Marqués-Perales, I. (2014). Beliefs about social fluidity and preferences for social policies. *Journal of Social Policy*, 43(3), 615–633.
- Jost, J. T. (2019). A quarter century of system justification theory: Questions, answers, criticisms, and societal applications.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58(2), 263–314.
- Kraus, M. W., & Park, J. W. (2017). The structural dynamics of social class. *Current Opinion in Psychology*, 18, 55–60.
- Kraus, M. W., & Tan, J. J. X. (2015). Americans overestimate social class mobility.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58, 101–111.
- Liu, C. J., Zhang, Y., & Hao, F. (2017). An implicit stereotype of the rich and its relation to psychological connectedness. *Journal of Pacific Rim Psychology*, 11, e7.
- Manstead, A. S. R. (2018). The psychology of social class: How socioeconomic status impacts thought, feelings, and behaviour.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57(2), 267–291.
- Rheinschmidt, M. L., & Mendoza-Denton, R. (2014). Social class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 in college: The interplay of rejection sensitivity and entity belief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07(1), 101–121.
- Rosette, A. S., & Koval, C. Z. (2018). Framing advantageous inequity with a focus on others: A catalyst for equity restoration.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76, 283–289.
- Sagioglou, C., Forstmann, M., & Greitemeyer, T. (2019). Belief in social mobility mitigates hostility resulting from disadvantaged social standing.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45(4), 541–556.
- Sánchez, A., & Goda, T. (2018). Corruption and the 'paradox of redistribution'.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140(2), 675–693.
- Schuck, B., & Steiber, N. (2018). Does intergenerational educational mobility shape the well-being of young Europeans? Evidence from the European Social Survey.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139(3), 1237–1255.
- Shariff, A. F., Wiwad, D., & Akinin, L. B. (2016). Income mobility breeds tolerance for income inequality: Cross-national and experimental evidence. *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11(3), 373–380.
- Sieben, I. (2017). Child-rearing values: The impact of intergenerational class mobility. *International Sociology*, 32(3), 369–390.
- Simandan, D. (2018). Rethinking the health consequences of social class and social mobility. *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 200, 258–261.
- Sorokin, P. A. (1959). *Social and cultural mobility* (2nd ed.). Glencoe, IL: Free Press.

Stephens, N. M., Townsend, S. S. M., & Dittmann, A. G. (2019). Social-class disparities in higher education and professional workplaces: The role of cultural mismatch.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8(1), 67–73.

Stevenson, B., & Wolfers, J. (2008). Happiness inequa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37(S2), S33–S79.

Wakslak, C. J., Jost, J. T., Tyler, T. R., & Chen, E. S. (2007). Moral outrage mediates the dampening effect of system justification on support for redistributive social policies. *Psychological Science*, 18(3), 267–274.

The “Double-Edged Sword” Effect of Class Mobility and its Psychological Mechanism

Zhang Yue, Guo Yongyu, Ding Yi, Li Kai

(School of Psychology,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7)

Abstract Class mobility refers to the change of individual’s relative rank in a hierarchical society. Upward class mobility is widely believed to bring benefit to both individuals and societies. However, recent research has evidenced that upward class mobility has negative effects as well. In this review, we focus on the “double-edged sword” (i.e., both positive and negative) effect of class mobility and its psychological mechanisms on individual and society.

At the individual level, people (especially for those lower-class members) would experience the cost of health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as a result of upward mobility. The acculturation thesis and dissociative thesis concerned and explained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effect of upward class mobility, respectively. However, the status-based identity framework provided an integrated view for explaining the “double-edged sword” effect of class mobility. Specifically, upward class mobility would generate status-based identity uncertainties, which were circumstances that led people to question and feel uncertain about their own identities. This kind of identity challenges would harm health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individuals.

At the societal level, the experience and perception of upward class mobility would lead people to underestimate and even tolerate social inequality, as well as be less likely to support redistribution policies. The societal effect of class mobility could be explained with internal attribution for the rich-poor gap as well as system justification belief. Specifically, when perceived higher class mobility, people might have greater tendency to internal attribution rather than external attribution of unequal wealth redistribution, which would lead people to less support redistribution policies. In addition, class mobility belief has also been conceptualized as a system-justifying ideology due to its focus on procedural fairness, that is, people believe that they are able to move up or down in a social hierarchy. Thus, class mobility perception is associated with more tolerance of social inequality and lower redistribution preferences.

The study of class mobility and its influence is in the ascendant, and there are many points for further study. Firstly, the performance of class mobility perception in China should be clarified. As a result of increasing social inequality, people’s perception of class mobility may be threatened. In addition, methods of class mobility measures remains a matter of some debate, thus further research is needed to investigate the applicability of such measurement methods in China while improving the measurement methods.

Secondly, future study should also focus on other psychological mechanisms of the effect of class mobility. For instance, we argue that class mobility would increase individual’s competitive and individualism preferences, which would lead to more self-interested motivations. Consequently, the competitive preference aroused by class mobility would be associated with more social isolation, as well as less support of redistribution policies.

Lastly, future study should also explore interventions that could minimize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class mobility. For example, a coherent and evolved status-based identity can be established with identity-based interventions, which can support individual’s health and well-being. Furthermore, some strategies (e.g., inequality frames and similarity focus) would be helpful to increase individual’s redistribution preferences as well.

Key words class mobility, health, subjective well-being, social fairness, the “double-edged sword” effect